

# 理性的迷途：论《易经》预测术

王 军

[摘要] 卜筮起源于理性对无知的反抗，可以说人类利用《易经》占卜的历史，就是理性精神不断彰显的历史。但是，《易经》预测术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石，经验性、偶然性、模糊性等缺陷，让它无法成为科学，因而所谓的《易经》预测术最终只是“理性的迷途”。

[关键词] 《易经》预测术；理性的彰显；理性的迷途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7) 02—025—03 ①

《易经》原本是占筮之书。就连易学界义理学派大师金景芳也说：“《周易》是卜筮之书，这一点，无论从《周易》卦、爻辞本身来看，从《周礼》、《左传》、《国语》诸书的有关记载来看，或者从《汉书·儒林传》说‘及秦禁学，《易》以筮卜之书独不禁’来看，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能否认。”<sup>〔1〕</sup>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用《易经》来预测吉凶，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误入歧途了。

## (一)

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往往经历了一个由迷惑、屈从、崇拜到努力认识、控制、利用的过程，预测术就是人们这种努力的结果。人们依据以往的经验，发现许多现象之间存在着比较固定的关联，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归纳、抽象并用于指导人们的生活，这就形成了最早的预测术。《易经》的预测——占卜也是如此。金景芳说：“应当知道，卜筮这种东西，原产生于无知，同时又是对无知的反抗，而渴求有知。因此，卜筮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具有两重性。又卜筮所以有灵，不能不借助于巫。巫为了取信于人，在长期发展中，很自然地不断向卜筮中输入有知因素，减少无知因素。”<sup>〔2〕</sup>《周易·系辞下传》也说：“古者包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3〕</sup>这就是说，八卦是古人在对各种现象观察后加以的抽象的结果，当然是人类试图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周易·系辞上传》又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sup>〔4〕</sup>也就是说“观物取象”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发现的许多现象之间的联系，用富于象征意义的图象（八卦）记录下来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sup>①</sup>，人们将八卦发展成六十四卦，又逐渐加上了卦辞、爻辞，最后成为今天流传下来的样子。并且，随着《易传》的出现，《易经》最终变成了一部哲学著作。正如金景芳所指出：“当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就发生了质变。……卜筮产生哲学，这种情况毋宁说是一条规律，没有什么奇怪的。”<sup>〔5〕</sup>《周易·系辞上传》有这样一段话：“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固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sup>〔6〕</sup>这里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卜筮，而是天道人事变化的哲理了。概而言之，《易经》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精神不断超越自身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曾说《易经》是一部中国的、特殊的《精神现象学》。<sup>〔7〕</sup>

## (二)

《易经》预测术诞生之后不断发生变化，但总的趋势是人的因素不断增多，理性精神日益彰显。

上古时代，人们向天神或鬼神卜问吉凶主要有龟卜和占筮两种方法。《说文》：“卜，灼龟也；筮，揲蓍也。”所谓龟卜就是将龟的腹骨和兽骨钻孔火烤，人们依据孔周围的裂纹形状来断定吉凶的预测方法。龟卜主要是殷人的预测方法，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因素的。著名易学专家朱伯崑教授指出：殷部族的祖先长期从事渔牧业生产，所以殷统治者将龟甲和兽骨作为向天神卜问吉凶的工具。<sup>〔8〕</sup>周人由于受到殷人的影响，所以也用龟卜。但是，周人更多地是

① 《易经》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中国古代先哲们群体智慧的结晶，伏羲、文王、周公只是其中贡献比较大的人物。

\*[收稿日期] 2006—10—16

[作者简介] 王军，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江苏南京 210093



发潮一般都会下雨，所以说“础润而雨”；看到做好事的人最终有好的结果，做坏事的人最终遭到恶报，所以说“善恶终有报”；看到事物发展到最高水平后会开始下降，所以说“物极必反”等等。如此说来，《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实在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以往发生过的不同情况的归纳和抽象。而卦与卦之间，爻与爻之间，之所以会有所变化，乃取决于人们在所处的卦、爻的具体情况时所采取的措施。所以在《易经》（《周易》）中经常有劝诫、警告人们的话。如此说来，《易经》的实质，更可能是类似于决策方略之类的书。<sup>[17]</sup>所谓“《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也就是体现了《易经》作者希望读《易》者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正确的措施，坚持正道的心愿。这样的话，《易经》预测就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了：首先要充分、正确地了解占卜者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在以往曾出现过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在《易经》（《周易》）中往往有类似情况的记载，然后再进行科学、全面的分析，就可以对事物的走向作出比较确定的预测。既然这样，那么不管用蓍草还是金钱作为演算的工具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对《易》道足够娴熟甚至可以不用起卦的工具。并且，只要人们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特定情况，采用恰当的举措，就可以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但是，这种解释有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易经》中体现的人们的经验是有限的，而且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会影响到事态发展走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

$$F(X) = f(x_1, \dots, x_n), (n \in \mathbb{N})$$

这个函数中， $n$  是个无法确定的数字，即：变量  $x$  的个数是不确定的。这样的话，只要有一个因素没有考虑到，那么运算结果都可能不正确。如果某些起重大作用的因素没有被占卜者考虑到，结果就更不可信了。

其次，许多现象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比如说水热了，是不是一定就是太阳晒的？就算如此，如果情况比复杂，那么这些所谓的因果联系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也就是说

$$F(X) = f(x_1, \dots, x_n), (n \in \mathbb{N})$$

这个函数如果是一个一元的、确定的、简单（基本）

函数，比如  $Y = 2X$ ，（ $X = 0, 1, 2$ ），那么，这种情况是很好处理的。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多元、复合函数，甚至这个函数的变量、其中的某些简单（基本）函数的解析式尚不确定，并且各个简单（基本）函数之间的互相影响也很复杂，那么这个复合函数的解析式就非常难以确定了。这样的话，运算就无从下手，如果一定要进行演算的话，那么这种演算往往也是无效的。就算其他因素都考虑到了（这当然需要非常高超的本领），只有一个能够影响到函数正负号的因素没有考虑进去，那么也只能得出南辕北辙的结果。

最后，在《易经》中记载的许多所谓的因果联系，往往只是人类以往经验片面的不完全归纳和抽象，因而这种因果联系往往不是必然的因果联系，至多是可能性比较大而已。建立在这种“因果联系”基础之上的演算是无法精确的。退一步来说，就算这些联系是可靠的，但是我们考虑的仍然只是一些可控因素，事实上还许多不可控的偶然因素也会影响到事态的发展。甚至某些不可控因素往往对事态的发展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发现：《易经》预测术的经验性，决定了它必然无法摆脱偶然性、片面性和模糊性，从而使《易经》预测术很难上升到科学的层面。

困境之三：决定论的思维模式需要检讨

《易经》的预测术还有一个理论前提就是决定论。宿命论是一种决定论，但是在今天多数人不会接受宿命论。同时决定论还会以科学的面貌出现，比如相信只要提供的条件确定，那么必然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决定论者对人、社会与世界的态度往往徘徊在绝对自信与绝对悲观之间：而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而事实上，所谓科学的决定论只是相信决定论者的一种信仰而已，这本身是否成立都是需要论证的。

《易经》预测原本是人类利用理性把握世界的努力，但是如果人们过分迷恋这种预测术而只停留在术（象数甚至占卜）的水平，不把对《易经》的研究上升到道（义理或者哲学）的层面，那么这种理性最终只能误入歧途。

#### 【参考文献】

- [1][2][5] 金景芳. 周易讲座·序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2, 2.
- [3][4][6][11] 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 (新版)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572, 556, 531, 548.
- [7]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第一册 (修订本) [M]. 人民出版社, 1980. 12.
- [8][9][14]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第一册 [M]. 昆仑出版社, 2005. 9, 9, 8-9.
- [10][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 (十三经注疏) (简体横排本)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37-638.
- [12][13] 金景芳, 吕绍刚. 周易全解 (修订本)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47, 548.
- [15][16] 刘大钧. 纳甲筮法·前言 [M]. 齐鲁书社, 1995. 2, 3.
- [17] 余敦康. 周易现代解读·前言 [M]. 华夏出版社, 2006. 2-5.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